

喧嚣与孤寂：《达洛维夫人》中的伦敦与伦敦人

余 莉*

内容提要：自波德莱尔提出“寻找现代性”之后，现代性便成为解读现代的重要关键词，现代主义文学亦无法不将现代性作为其表现和探究的主题之一。随着第三世界日益陷入现代化的变动之中，现代主义不仅没有衰竭，反而日渐显示出它的作用。本文借鉴斯宾格勒的“城市心灵”概念及相关的现代性研究成果，对《达洛维夫人》中的伦敦与伦敦人进行了重新解读，发掘这部现代主义杰作对于当下的意义，指出它揭示了繁华喧嚣的都市与冷漠孤寂的都市人这一对充满现代性悖论的存在。

关键词：现代性；城市心灵；弗吉尼亚·伍尔夫；《达洛维夫人》；伦敦

Abstract: Since Baudelaire's "searching for modernity", modernity has remained a key word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modern". Modernity has also been an important subject of modernist literature. With the Third World countries getting increasingly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modernism is releasing its greater power rather than waning to an end. By resorting to Spengler's concept of "the mind of city" and other researches on modernity, this paper explores London and the London people represented in Virginia Woolf's *Mrs Dalloway*, disclosing that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masterpiece is that it is an exploration of the paradox of modernity: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prosperous metropolis and the secluded urbanite.

Key words: modernity; mind of city; Virginia Woolf; *Mrs Dalloway*; London

* [作者简介]：余莉，兰州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西方文论的翻译与研究。

简·戈德曼(Jean Goldman)在《剑桥伍尔夫概论》(*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Virginia Woolf*, 2005)中按照年代顺序对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伍尔夫研究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她认为自20世纪40年代至今,众多批评家和学者分别从意识流手法、哲学、心理学、神话学、女性主义、现代主义美学、后现代主义、性别/文本政治、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伦理学等视角对伍尔夫的作品进行了剖析。进入21世纪之后,研究者越来越关注伍尔夫作品与现代性的关系,这方面的代表专著包括《伍尔夫与布鲁姆斯伯里的先锋性:战争、文明与现代性》(*Virginia Woolf and the Bloomsbury Avant-garde: War, Civilization, Modernity*, 2007)、《伍尔夫、现代性与历史:本雅明星群》(*Virginia Woolf, Modernity and History: Constellations with Walter Benjamin*, 2010)、《伍尔夫、时尚与文学现代性》(*Virginia Woolf, Fashion and Literary Modernity*, 2009)等,这些研究者都将目光投注在伍尔夫作品中的现代性体验上。同时,国内的研究者也对伍尔夫小说中的现代性元素展开了研究,(尹星 2012;魏小梅 2012;宋文 2008),这些论文或借用波德莱尔的“漫游者”概念,或结合女性主义和空间批评的相关理论,探究了伍尔夫小说中的现代性元素,它们都依据各自的立场侧重于现代性的某一方面,可以说现代性确实构成了当前伍尔夫研究的一个新焦点。

《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 1925)至今仍是伍尔夫最受瞩目的作品,福斯特(E.M. Foster, 1879—1970)视其为伍尔夫的“杰作”,赞赏它对伦敦的再现闪动着神秘主义的幽光,并认为伍尔夫在该小说中创立的“隧道掘进”使她从表象开始一直到达她所能企及的最深处。(Forster 175)。福斯特道出了构成《达洛维夫人》持久魅力的一个特征——伦敦的风貌。在伍尔夫笔下,伦敦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空间场所或景观形象,而是她整个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意象之一,正如她自己所言,伦敦本身永远吸引我、刺激我,无需任何麻烦,只要挪动双腿就能给我提供剧本、故事或诗歌素材……独自漫步在伦敦就是最好的休息。(Woolf Vol.3: 186, 298)伍尔夫的小说作品,除了《到

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 1927)和《幕间》(*Between the Acts*, 1941),全部涉及伦敦或以伦敦作为场景,由此可见,伦敦可谓解读伍尔夫小说的一把钥匙。国内现阶段的研究较为关注伦敦作为空间的含义,本文则借鉴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的“城市心灵”概念以及相关的现代性研究成果,分析都市(伦敦)心灵统摄之下都市人的精神状态。

一、城市与现代性

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的现代性概念出自其对画家居伊的赞赏和推崇,后者在大城市的风光中,在“由雾霭抚摸着或被太阳打着耳光的石块构成的风光”中,在“曲线毕露的女人,美丽的、活得幸福、穿得好的孩子”身上,在“林荫道上空响彻了像希望一般诱人而轻松的军乐声”中寻觅(波德莱尔 627),他所寻找的便是所谓的“现代性”。显然,对于波德莱尔而言,现代性栖居于都市,都市既是现代性的存在空间,也是它的表达方式。“现代性必须在都市中展开,而都市一定是现代性的产物和标志,二者水乳交融”(汪民安 11)。对现代性的讨论必然始于对城市(尤其是对城市心灵)的探究。

在对城市心灵的研究中,斯宾格勒对比了两个相互对立的世界。迈锡尼世界和米诺斯世界。相比较而言,米诺斯世界代表了城市文明的初级阶段,其特点是对高级文明的需求,在建筑、家具、装饰等方面都体现出长期积累的技术和趣味,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特点是居民居住在商业中心,这表明城市确实象征着现代文明的萌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高级阶段。关于城市的发展,斯宾格勒的论述值得在这里详细引述:

是晚期的城市首先挑战了土地,以其轮廓的线条与自然冲突,否定着全部的自然。它想要成为一种不同于自然且高于自然的东西。那些高耸的山墙,那些巴洛克式的圆顶屋、

尖阁和尖塔,与自然毫不相干,也根本不想与自然发生关系。接着,出现的是巨大的国际都会,即作为世界的城市,它不能容忍其他的任何东西存在于自己的近旁,故着手灭绝了乡村的图像,而现在,它却坚持要对方来适应它,变得和它自己一样。于是,郊野,大道、树木、牧场都变成了公园,山岭变成了旅游者观光的景区;而在城内,则出现了一种仿造的自然,用喷泉取代了泉水,用花坛、人造水池和修剪整齐的篱垣取代了草地、池泽和丛林。(斯宾格勒 449)

由此可见,城市的发展,尤其是大都会的出现,不仅意味着一种新的空间样态,而且意味着在这个新型空间的生产过程中,人类不断地将理性和力量施加于自然。随着新的地貌景观的出现,人同自然的关系也发生着质的改变。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不再如乡村时期那般,彼时人对自然做出温和的改变,是自然的合作者,而此时人作为君主,要自然听命于己。这种新兴的空间一旦开始形成,便不再是事件被动的承受者,而是作为一种主动的力量,对生活于其中的人施加自己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城市就好比一台具有超常力量的巨大机器,一旦开动,便没有人能让它停下来。在城市中,货币成为资本,带动一个个新的产业链条,导致分工不断细化,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及至 19 世纪下半叶和 20 世纪上半叶,大都市更是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文化维度。它不仅仅是非常巨大的城市,更是新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开始形成的地方。

不过,究其根本,都市的种种功能和意义均源于它从货物中抽象出了价值,并“把它固定在金属的或虚构的量中,以便把货物当做‘商品’来加以衡量”(斯宾格勒 452)。金属或虚构的量的物质形式便是货币,正是在城市中,“货币变成了一种力量,而且这种力量完全是理智的,只能通过它所使用的金属量来描绘”(斯宾格勒 452),这使得精确的计算成为城市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技术要求,也意味着城市文化在根本上是一种商品文化,都市在这种商品文化的推动下变成了商品的海洋。丰富多彩的商品不断刺激着都市人的感官和神经,

激起他们狂热的追逐欲望。然而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进入消费主义的环境或许是免费的，但真正参与其中却要付出代价。（Abbott 1992）于是，在精于算计的同时，都市人越来越表现出克制、冷漠和退隐。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就曾对伦敦人的自私、冷漠作出了辛辣的谴责：

可是他们彼此从身旁匆匆地走过，好像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好像他们彼此毫不相干，只在一点上建立了一种默契，就是行人必须在人行道上靠右边走，以免阻碍迎面走过来的人；同时，谁也没有想到要看谁一眼。所有这些人愈是聚集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每一个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时的这种可怕的冷淡，这种不近人情的孤僻，就愈是使人难堪，愈是可恨。虽然我们也知道，每一个人的这种孤僻、目光短浅的利己主义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的和普通的原则，可是这些特点在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像在这里，在这个大城市的纷扰里表现得这样露骨，这样无耻，这样被人们有意识地运用着。（恩格斯 319）

这正是货币成为城市的绝对霸权力量之后必然导致的城市人的精神异化。都市人并不像乡村或小城镇的人那样彼此之间拥有血缘的纽带、稳定的邻里关系以及世袭的生活方式。相反，都市人更多是完全独立的个体，他们有着不同的身世背景和兴趣爱好，他们看似自由，却无法拥有完整的自我，所以，他们在很多情况下处于无所适从、身不由己的状态，借用路易·沃斯（Louis Wirth, 1897—1952）对都市人的判断，“城市人之间的接触可能是实际的面对面的接触，但是归根到底这些接触是非个人的、表面的、短暂的，因此也是部分的”（沃斯 706）。由于城市中的一切都必须转化成货币以确定和彰显其价值，因此城市中虽然有广场、公园、剧院等公共空间为城市居民创造了自由、平等地交流的可能，但货币掌控下的城市人却不得不使用理性来重新评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

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马克思、恩格斯 614),都市人便只能以麻木、冷漠作为自我保护的手段。

可以看到,现代性的形成及凸显过程也是城市心灵的塑造过程。分工、货币、商品使原本浑然一体的生活破碎化。如果把城市比作一台巨大的机器,个人只是这台机器上各就其位的零件,这台机器的构造越复杂,个人的功能便越单一,个体之间的交叉越不易发生,个人之间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便成为任何个人都无法拥有的奢侈品。这反过来又强化了货币和商品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霸权地位。以货币和商品为主要表征的都市心灵必然以某种方式投射到都市人的精神世界,对他们的生活产生极大的影响,乃至决定他们命运的归宿。

二、《达洛维夫人》中的伦敦与伦敦人

19 世纪末,伦敦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中心和船业中心,这里的技术和知识、便利的金融服务吸引着各方的投资者,催生着更多的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持续增加。火车和有轨电车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伦敦的劳动力供给,它们缩短了伦敦郊区到市中心的距离,提高了交通效率,使住在郊区的人可以到伦敦市中心工作,这也为伦敦城市边界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提供了基础。到 1884 年,伦敦的人口已是纽约的三倍,是名副其实的大伦敦(Greater London)。(Penny-backer 16)但是,伦敦城的财富并未惠及每一个伦敦人,自 19 世纪 50 年代起,伦敦东区的贫困成为社会调查的重点关注对象,随之引发了规模不等的集会示威活动,最终导致了伦敦城的改造工程,老尼科尔贫民区被清除,霍尔本大街与斯特兰德大街之间迷宫般的街道也得到改造。(Whitworth 2005)

伴随着贫民区的改造,地方政府也建造了大量住房以缓解过度拥挤的居住条件。但是,人们发现,在大伦敦建造的五十万栋房屋有

五万栋被闲置。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潮湿阴冷、卫生条件差的地下室和半地下室不适合居住,他们呼吁建设有益健康的房屋、优雅的城市和宜人的郊区。于是,1898年,由风景规划设计师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 1850—1928)牵头,伦敦开始了花园城市运动,建设经过精心规划的林荫大道和开放性的公共空间。花园城市运动一直持续到1920年,这一乌托邦设想代表了当时建设美好未来的乐观主义精神,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该设想遭受重创,但它却依然是这一时期现代性的突出特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19年的《房屋法案》对一战归来的士兵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所以《达洛维夫人》中的史密斯夫妇尽管生活拮据,但也居住在富人区。这些城市建设政策都影响到伍尔夫在《达洛维夫人》中再现伦敦时所表现出的理想主义基调。

《达洛维夫人》的故事发生于1923年6月的某个星期三,当时的伦敦已经走出一战的阴霾,伍尔夫在小说伊始,便迅速将读者带进伦敦的大街。在维多利亚大街上,到处是欢快的声音和情景:“胜利的欢庆声、铃儿的叮咚声和头顶上飞机飞过的奇特的尖啸声”;“飞奔的马蹄的嘚嘚声,板球拍的轻击声”;“欢腾的小马……旋转着的小伙子,穿着透明薄纱衫的欢笑的姑娘”(伍尔夫4—5)。这些描写几乎可以看作波德莱尔用于昭示现代性的巴黎风光的翻版,它也成为伦敦现代性的符号。商铺的老板正忙着将“人造宝石和钻石以及漂亮的海绿色的旧胸针放在18世纪的底座里,以吸引美国佬”(伍尔夫5),即使这已经透露出略带奸诈的商业气息,但它却丝毫不影响笼罩着整个伦敦的欣欣向荣。面对眼前热闹、充满活力的景象,克拉丽莎说她喜欢在伦敦走走,这的确是发自内心的赞叹,是对现代生活的认同。

《达洛维夫人》脱胎于伍尔夫之前的短篇小说《达洛维夫人在邦德街》(“Mrs Dalloway in Bond Street”, 1923),可以说,邦德街上的情境构成了伦敦“漫游”的中心,也成为解读小说中伦敦意蕴的重点。邦德街呈现出明显的商业景观:“它那飘扬的旗帜;它的商店;没有铺排;没有炫耀;一匹粗花呢陈列在她父亲50年间一直买套装的商店

里;几粒珍珠;放在冰上的大马哈鱼”;“在战前,你可以在这里买到几乎完美的手套”(伍尔夫 10)。有研究者认为,这些商业景观的意义在于它们是克拉丽莎辨认自我身份的媒介,因为她关注的并非商品本身,而是它们所引发的关于父亲和叔叔的回忆,因此,克拉丽莎“是与现代商品文化景观格格不入的。她不屑与现代的大众消费为伍,不盲目跟随现代消费市场的时尚潮流;她的购物行为洋溢着自信与自我,是行使主体权利的过程”(尹晶 135)。

《达洛维夫人》对当下的展示始终与过去难解难分,对伦敦的描写也与回忆中的伯顿互成对照。伯顿是少女克拉丽莎生活的地方,她与彼得的恋爱和争吵,她同莎利带有同性恋意味的友情都充满了生命本能的冲动与激情。尽管伍尔夫对伯顿的描写充满田园诗般的美感,而且克拉丽莎也“坚信自己是家乡树木的一部分”,但“她热爱的是此时、此地、眼前的一切”(伍尔夫 8)。她拒绝了自己的初恋情人而成为达洛维夫人之后,她的生活就改变了模样,她为一位贵妇人邀请达洛维一起共进午餐,却没有邀请自己而焦虑忧心;她准备华丽的晚宴,在展示自己作为一个优雅女主人的风采的同时,为丈夫集聚更多的人脉。这其实正体现了都市人交往的非个人性和不稳定性。西美尔(Georg Simmel, 1858—1918)在《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一文中指出,“都会性格的心理基础包含在强烈刺激的紧张之中,这种紧张产生于内部和外部刺激快速而持续的变化”(西美尔 639)。都会作为一个“物的差异性海洋”在每一个瞬间都带给都市人新的感官刺激,使他们在物面前日渐渺小,物的日渐强大迫使城市人用虚伪的欣赏来掩饰因无力占有而产生的焦灼感,来填补变幻莫测的人际关系所导致的空虚感。克拉丽莎生活在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伦敦,不得已的种种应酬早已消磨了生命原本的占有欲望,世故冷漠、装腔作势恰是她在伦敦的性格标签。所以,彼得在摄政公园一觉醒来后,对克拉丽莎做出了最终的判断:“她的灵魂死了”(伍尔夫 53)。

邦德街对于解读小说中伦敦现代性的重要作用还在于其对人群的展现。都市的人群是现代主义作品中一个重要的意象,他们“是一

个前所未有的景观，它庞大的体积和散发出来的巨大能量，使之成为现代性震惊的漩涡”（汪民安 15—16）。本雅明通过对巴黎街头人群的研究，发现都市人群是一个具有极大匿名性的个体群，他们拥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在街道上晃荡，但他们之间不攀谈，不交流，各自处于封闭状态。都市人群也成为本雅明解释现代性的窗口，他由此发现了现代人新的行为方式：“面对对象，不求甚解，只求功效”（王才勇 128）。伍尔夫对邦德街上人群的描写为本雅明的结论提供了一个恰切的文学注脚。剧烈的爆炸声让街上的行人“停下脚步看热闹”，“然而流言立刻从邦德街中段传出，传到了牛津街，传到了阿特金森香水店；它既看不见又听不见，像一片浮云，迅速地如面纱般漂到山头，确实以云一般突然而至的庄重和静谧飘落到一秒钟前还全然是一片慌乱的人们的脸上”（伍尔夫 13）。伍尔夫在此抓住了最能体现都市人心理特质的东西——流言。它来去无影，没有人对它的真伪负责，也没有人在意它的真伪。它是匿名的都市人群获取信息最便捷的渠道，且常常被当做权威的声音，因为人们需要的不是真相，而是感观的刺激，这使他们麻木冷漠的精神有片刻的兴奋和不一样。就像小说中邦德街上驶过的那辆神秘轿车，里面坐的究竟是谁并不重要，但它确实让街上的人群热闹了一番。

《达洛维夫人》对人群的描写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即文本提到了路人的名字，描述了一些片段。例如，埃德加·杰·沃基斯……说道“所相（首相）的汽擦（汽车）”（伍尔夫 13），“那位老法官约翰·巴克赫斯特爵士……”（伍尔夫 16），“抱着孩子的莎拉·布莱奇”，“埃米莉·科茨则不断扫视皇宫的窗户……”，“个子矮小的鲍利先生”（伍尔夫 18）等。这些人无论是对情节的发展，还是对主要人物的心理变化和命运，都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其实就是电影中的路人甲。我们注意到一个事实，即都市街道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活生生的个体，他们有名有姓，有各自具体的身份，有各自鲜明的特点，有各自特殊的经历，但是，除了作家之外，这个城市不会给予他们任何关注，都市人群的目光或者说都市的目光永远只投给权力和财富，个体同他们的名

字一样都不过是城市中一个空洞的符号。这些姓名的出现恰恰突出了单独的个体在都市人群中的孤寂,“人们在任何地方都感觉不到在大都市人群里感到的孤立和迷失”(汪民安 13),而这却是都市人最寻常的存在状态。这些名字实际上体现了伍尔夫对现代都市人深刻的悲悯情怀。

伍尔夫在日记中记载了她对《达洛维夫人》一书的设想。她计划写一本关于精神错乱与自杀的书:同一个世界在精神错乱者与正常人眼中的呈现。(Woolf Vol.2: 248)伍尔夫确实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位精神错乱者的形象——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塞普迪莫斯,都市人的孤寂在他身上得到了极致的表现。在摄政公园里,当周围的人都被天空中的飞机所吸引之时,他感受到的却是树的活力,揣摩的是麻雀的话语,他不愿意接受包括妻子在内的所有人,因为他们都认为他不正常。所以,他要“离开人们——他们必须离开人们”(伍尔夫 22),最终他选择了自杀。塞普迪莫斯的命运是个体与现代性的冲突所导致的悲剧。克拉丽莎作为完美的女主人代表了理性,她所热爱世界却被塞普迪莫斯所厌弃。在此,我们不得不再次面对现代性的一个经典困惑:谁有权利对理性与非理性进行界定和划分?谁的理性应该获得优先权?

克拉丽莎和塞普迪莫斯共同构成了这部小说的两个焦点。克拉丽莎热衷于华丽的晚宴(接近人们),而塞普迪莫斯却要从人们身边逃离。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在寻找同样的东西:沟通和现实的完整。但是,塞普迪莫斯选择了真正获得这两样东西的准确途径,即死亡,只有死亡能消弭所有的恐惧,填平所有的距离,而克拉丽莎通过宴会来实现沟通和完整的努力只不过是一个幻象,宴会上的沟通是短暂的,随着宴会的结束,所有人将重新回到原先的自我。

结 语

《达洛维夫人》一书展现了 20 世纪初伦敦的喧嚣与伦敦人的孤

寂。作为世界性帝国的首都,工业化和殖民化聚集起来的巨大财富在那一时期为伦敦的巨大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使其在政治、经济、人文、娱乐、科技发明等领域均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伦敦人的生活状况也因此得到巨大的改善。可以肯定地说,现代性在当时的伦敦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然而,现代性的负面作用也随之呈现。现代性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以理性、技术、商品为其标志,对都市人的精神施加影响,对此,查尔斯·泰勒有精辟的阐释,“令人害怕的是,应该有其他标准来确定事情,却要按照效益或‘代价—利益’来决定;应该教导我们生活的那些目的,却要产出最大化的要求所遮蔽”,“过去服务于我们的那些可靠的、持久的、总是意味深长的东西,正在让位给那些堆积在我们周围的快捷的、廉价的、可替换的商品”(泰勒 759)。因此,泰勒提出的现代性的三个隐忧——意义的丧失与道德的褪色、目的的晦暗、自由的丧失——在今天对于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而言是一个深刻的警醒,《达洛维夫人》的意义正在于以文学的手法细致地再现了繁华喧嚣的都市与冷漠孤寂的都市人这个现代性悖论。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Abbott, Reginald. "What Miss Kilman's Petticoat Means: Virginia Woolf, Shopping, and Spectacle." *Modern Fiction Studies*, 38 (1992): 193-216.
- Foster, E. M. "A Survey of Virginia Woolf's Work." *Virginia Woolf: The Critical Heritage*. Ed. Robin Majumdar and Allen McLauri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5.
- Froula, Christine. *Virginia Woolf and the Bloomsbury Avant-garde: War, Civilization, Modernity*. New York: Columbia UP, 2007.
- Goldman, Jean.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Virginia Woolf*.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5.
- Koppen, R S. *Virginia Woolf, Fashion and Literary Modernity*. Edinburgh: Edinburgh UP, 2009.

- Pennybacker, S.D. *A Vision for London, 1889 - 1894: Labour, Everyday Life and the London County Council Experiment*. London: Routledge, 1995.
- Spiropoulou Angeliki. *Virginia Woolf, Modernity and History: Constellations with Walter Benjamin*. New York: Springer, 2010.
- Whitworth, Michael. *Authors in Context: Virginia Woolf*. Oxford: Oxford UP, 2005.
- Woolf, Virginia. *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 Vol. 2*. Orlando: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81.
- . *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 Vol. 3*. Orlando: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81.
- 恩格斯:“大城市”,《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一卷),薛毅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 查尔斯·泰勒:“现代性的三个隐忧”,《现代性基本读本》,汪民安,陈永国,张云鹏主编,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55—760页。
- 格奥尔格·西美尔:“大都会与精神生活”,《现代性基本读本》,汪民安,陈永国,张云鹏主编,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39—647页。
- 路易·沃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现代性基本读本》,汪民安,陈永国,张云鹏主编,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00—711页。
-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节选”,《现代性基本读本》,汪民安,陈永国,张云鹏主编,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11—620页。
- 斯宾格勒:“城市的心灵”,《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一卷),薛毅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 宋文:“现代性与女性都市空间的建构——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解析”,《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36—40页。
- 汪民安:《现代性》,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 王才勇:“灵韵、人群与现代性批判——本雅明的现代性经验”,《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第127—133页。
- 魏小梅:“都市、心灵、阶层:《达洛维夫人》中的伦敦”,《国外文学》,2012年第1期,第96—102页。
- 伍尔夫:《达洛维夫人》,王家湘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
- 夏尔·波德莱尔:“《现代生活的画家》节选”,《现代性基本读本》,汪民安,陈永国,张云鹏主编,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21—638页。

尹晶：“作为城市漫步者的伍尔夫——街道、商品与现代性”，《外国文学》，2012年第6期，第129—136页。